



大会

Distr.: General
26 December 2019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第七十四届会议

议程项目 41

塞浦路斯问题

2019 年 12 月 5 日土耳其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谨随函转递 2019 年 12 月 3 日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代表伊斯梅特·科鲁克奥卢给你的信(见附件)。

请将本信及其附件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41 的文件分发为荷。

常驻代表

费里敦·瑟纳尔勒奥卢(签名)



2019 年 12 月 5 日土耳其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的附件

我写这封信是为了回应希族塞人行政当局代表 2019 年 10 月 18 日在第三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就议程项目 70(b)(促进和保护人权：人权问题，包括增进人权和基本自由切实享受的各种途径)所作的发言，其中载有对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和土耳其的不实指控。由于希族塞人方面出于虚假宣传目的、在土族塞人方面没有出席的国际平台上甚至将高度敏感的人道主义问题政治化，我不得不进行书面答复，以澄清事实。

希族塞人方面一直在向国际社会提供错误信息，将塞浦路斯问题描述为“入侵”和“占领”问题。安全理事会关于塞浦路斯的所有决议都没有将 1974 年土耳其合法和正当的干预描述为“入侵”或“占领”，因为干预是根据 1960 年保证条约进行的，发生在雅典军政府及其希族塞人同伙组织了旨在将整个岛屿并入希腊并彻底消灭土族塞人的未遂政变之后。应该强调的是，塞浦路斯问题始于 1963 年而不是 1974 年，1963 年希族塞人方面强行篡夺了塞浦路斯共和国伙伴关系的称号，并将其土族塞人伙伴驱逐出所有国家机关，1974 年土耳其进行了和平干预。在希族塞人代表顺理成章地选择加以忽略的 1963 至 1974 年间，希族塞人在希腊的帮助和鼓励下，参加了针对土族塞人的种族清洗运动，即所谓的“阿克里塔斯计划”，其最终目的是实现“希塞统一”(将该岛并入希腊)。事实上，正是这种大规模的暴力事件迫使安理会在 1964 年部署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持和平部队(联塞部队)，以制止针对土族塞人的流血和暴力事件。

同样，与希族塞人代表指控的情况相反，“流离失所者”问题可追溯到 1963 年，当时土族塞人民众因希族塞人长达 11 年的袭击而被迫不断逃生、沦为无家可归。尽管 1974 年希腊人/希族塞人政变及其后果导致许多土族塞人和希族塞人流离失所，但流离失所者问题通过双方 1975 年在维也纳举行的第三轮会谈中达成的《自愿交换人口协定》得到解决。该协定是在联塞部队的监督下执行的，联合国有关文件(1975 年 8 月 5 日 [S/11789](#) 和 1975 年 9 月 10 日 [S/11789/Add.1](#))妥善记录了该协定及其执行情况。

希族塞人代表似乎对处理侵犯个人和集体人权和基本自由的行为“感兴趣”，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忽视了岛上最严重的侵犯人权行为，即他自己的政府以不公正和不人道的方式孤立土族塞人。全方位的孤立包括剥夺土族塞人在国际舞台上的代表权，包括在文化、学术和体育活动中的代表权；防止和限制土族塞人出国旅行和对外交流；减少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我谨借此机会重申，对土族塞人实施的不公正孤立是毒害双方及其人民关系的最重要因素，阻碍了通过谈判解决该岛问题。

希族塞人代表关于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人口工程”的指控也是没有根据的，是希族塞人方面正在进行的宣传活动的产物。在北塞浦路斯获得公民身份的程序与世界各地广泛采用的程序类似。在这方面，应该指出，希族塞人行政当局已根据其国内立法允许数千名非希族塞人移民在南塞浦路斯定居，其中包括来自希腊的移民。此外，希族塞人行政当局正因 2013 年实施的“以投资换取公民

身份”计划而受到欧洲联盟和美国的严格审查，根据该计划，最低投资 200 万欧元(合 220 万美元)就可以购买一本护照和在欧洲联盟各地的免签证旅行。通过该计划获得的“黄金护照”为通过离岸公司进行巨额洗钱打开了大门，并导致欧洲境内的犯罪活动增加，同时还帮助了一些逃犯。

关于希族塞人代表就财产问题发表的评论，应当指出，希族塞人方面没有为土族塞人在南塞浦路斯的财产提供有效的补救机制；与希族塞人方面不同的是，土族塞人方面承认并尊重财产权，包括将财产留在北塞浦路斯的希族塞人的财产权。因此，土族塞人方面建立了有效的国内补救机制，即欧洲人权法院承认的不动产委员会，以根据欧洲人权法院的裁决解决希族塞人的索赔问题。截至 2019 年 11 月，已向该委员会提交 6 619 份希族塞人的申请，其中 1 169 份已通过友好解决审结，33 份通过正式听证审结。

另一方面，由于南塞浦路斯的“托管法”，不得不放弃南塞浦路斯财产的土族塞人仍然无法要求任何形式的有效补救，包括赔偿。根据南塞浦路斯的“托管法”，希族塞人行政当局充当土族塞人财产的“托管人”，阻止将其归还、交换或赔偿给土族塞人。这方面两个突出的例子是南塞浦路斯拉纳卡和帕福斯机场所在的土地，土族塞人业主对这些土地有财产权要求。

关于“被飞地”的说法，不幸的是，希族塞人行政当局把居住在北塞浦路斯的希族塞人和马龙派教徒用作其政治权宜之计，称他们为“被飞地者”。居住在北塞浦路斯的希族塞人和马龙派教徒自己否认他们“被飞地”的说法，对卡尔帕斯的希族塞人居民进行的访谈就反映了这一点。当一名记者提到他此行的目的是要看看该地区“被飞地的人民”时，采访对象回答说：“被飞地？我们没有被飞地！”(Poltis 报，2017 年 10 月 10 日)。此外，根据 1975 年《自愿交换人口协定》，选择居住在北塞浦路斯的希族塞人和马龙派教徒享有给予所有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公民的全部权利和自由，包括行动、宗教、言论、教育等自由。我还想提醒希族塞人代表，“被飞地”一词最初是由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创造的，用来描述 1963 至 1974 年间土族塞人的困境，希族塞人强迫土族塞人生活在散布该岛各处的只占塞浦路斯领土 3% 的零星土地上。

关于宗教自由，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极为重视保护宗教自由，并根据其宪法特别是宪法第 23 条规定的原则，根据《世界人权宣言》第 18 条，为人民提供自由信奉宗教的环境。居住在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的每个人，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无论其宗教信仰如何，都有进入礼拜场所的自由。

此外，虽然居住在国外的人(包括居住在南塞浦路斯的人)可以在自己的边界内自由信奉其宗教信仰，但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坚持一项政策，即最大限度地额外允许他们前来北塞浦路斯并信奉其宗教信仰。在这方面，土族塞人方面提供便利，满足来自南塞浦路斯的希族塞人和马龙派教徒在一些具有重要宗教意义的教堂和修道院举行集体宗教仪式的请求。土族塞人方面为之提供方便的非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居民举办的群众性宗教活动的数量每年都在增加，2019 年 7 月 10 日秘书长关于联塞部队的最新报告(S/2019/562)也承认了这一点。2019 年 1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北塞浦路斯各宗教场所举行的获得批准的宗教仪式数量已经达到 134 次。

然而，希族塞人行政当局对南塞浦路斯宗教信仰自由和进入宗教场所的限制有增无减。与北塞浦路斯的 77 座教堂不同，希族塞人方面只有 8 座清真寺开放礼拜，而且只是在博物馆开放时间开放，这不足以满足伊斯兰信仰的要求。此外，在这 8 座清真寺中，有 2 座甚至缺乏在祈祷前按照伊斯兰信仰要求进行洗礼的洗礼/洗手设施。正如联合国文化权利领域特别报告员卡里玛·贝农女士在 2016 年 6 月 6 日结束其对塞浦路斯的访问时提出的初步结论和意见中所说的那样，南塞浦路斯的许多穆斯林礼拜场所继续被全天候封锁，没有供个人或集体申请进入和/或进行宗教朝圣的已知程序。

与希族塞人代表的指控相反，土族塞人方面始终对居住在北部的希族塞人的教育需求采取积极的做法，而且根据这一认识，于 2004 年 9 月在现有的已在卡尔帕兹运作 30 多年的小学以外，为居住在该地区的希族塞人学生开设了一所中学。这些学校的希族塞人儿童由希族塞人教师按照南塞浦路斯适用的相同课程进行教育。事实上，希族塞人教师由相关希族塞人主管部门任命，教科书也由希族塞人行政当局提供。然而，送往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希族塞人学校的上述教科书中有一些包含不适当的内容、陈旧的宣传以及针对土族塞人和土耳其人的攻击性、沙文主义和种族主义语言，例如称他们“野蛮”。这种不恰当的内容可能会对幼童的发展有害，并对子孙后代对他人的看法产生负面影响。同样，由于有些教师使用种族诽谤和冒犯性语言，他们的聘任亦没有获得有关部门的批准。然而，希族塞人行政当局试图将少数未获批准的教师和书籍的问题政治化，就好像这一切是在真空中进行的一样。

另一方面，尽管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提出了正式建议，而且希族塞人主管部门接受了他在 1996 年 6 月 7 日报告(S/1996/411)中提出的建议，但希族塞人方面仍然拒绝履行其拖延已久的承诺和义务，即在利马索尔区开办一所土族塞人小学，以满足居住在塞浦路斯南部的土族塞人儿童的教育需求，并使他们能够获得母语授课。

我还认为有必要强调，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已经修订了其教科书，增加了促进理解、宽容和友谊的内容。相比之下，希族塞人方面一直拒绝修订南塞浦路斯希族塞人学校使用的教科书，这些教科书仍然载有种族主义和沙文主义内容。

关于希族塞人代表就“失踪人员”问题所作的发言，我愿重申，土族塞人方面在这一对双方都产生影响的人道主义问题上尽最大努力协助和促进塞浦路斯失踪人员调查委员会的工作，以期委员会能够顺利完成任务。尽管土族塞人方面持有人道主义立场，但不幸的是，希族塞人方面的唯一目的是将失踪人员问题政治化，将其提交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平台，而不是积极参与委员会的工作。

为支持塞浦路斯失踪人员调查委员会的工作，土族塞人方面于 2016 年成立档案委员会，其成员包括军事当局、警察当局、卫生部和国家档案馆的专家以及政府其他有关单位，目的是审查有关档案，获取塞浦路斯失踪人员调查委员会要

求的有关失踪人员下落的信息。在此情况下，土族塞人成员办公室获准查看 1974 年的航空照片。土族塞人方面还在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总统府下设立了一个调查单位，以审查所有相关档案，收集塞浦路斯失踪人员调查委员会要求的关于失踪人员可能下落的信息，还设立了失踪人口调查股，该股在宪法上独立的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总检察长办公室的监督下，对确定的希族塞人失踪人员案件进行刑事调查。此外，一旦发现关于潜在埋葬地点的证据，土族塞人方面就允许塞浦路斯失踪人员调查委员会进入整个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境内的任何地区，无论是通过中断主要道路的建设，还是通过准许塞浦路斯失踪人员调查委员会进入根据其工作计划要求进入的军事区域。在这方面，2019 年 6 月，准许塞浦路斯失踪人员调查委员会进入北塞浦路斯军事区域的另外 30 个疑似埋葬地点，将根据塞浦路斯失踪人员调查委员会的挖掘规划在这些地点进行挖掘。还应指出，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和土耳其都继续在资金上支持塞浦路斯失踪人员调查委员会。

希族塞人方面忙于散布关于土族塞人方面和土耳其的错误信息，因此尚未对塞浦路斯失踪人员调查委员会关于搜查其军事或警察报告、航海日志、医疗报告或任何其他包含可能是埋葬地点或失踪人员遗骸的信息的呼吁做出任何回应。对土族塞人失踪人员死亡事件进行的刑事调查都没有查明肇事者或起诉被指认者。此外，时至今日，希族塞人方面尚未能够在便利进入所有军事地区以及获取希族塞人警察档案方面提供对等待遇，希族塞人警察直接参与针对土族塞人的大规模暴行，特别是在 1963 至 1964 年期间。

至于有关北塞浦路斯文化遗产的指控，我要强调，土族塞人方面尽管资源匮乏，但保护和保存了塞浦路斯岛的文化遗产，这些遗产源于贯穿该岛历史的丰富多样的文化和文明。土族塞人方面努力保护和保存北塞浦路斯的文化遗产，无论其来源如何；此外，土族塞人方面还积极参与文化遗产技术委员会的工作，并为其作出建设性贡献，这是双方如何可以通过合作为两国人民造福的一个突出例子。2019 年，已经就修复 PaşAköy/Ashia 的 Panagia 教堂和 Gaziköy/Afania 的 Ayos Artemios 教堂开展工作，这些工作很快就会完成。

另一方面，希族塞人代表对南塞浦路斯土族伊斯兰文化遗产的不幸状况视而不见。自 1963 年以来，希族塞人行政当局一直奉行根除塞浦路斯土族伊斯兰传统所有痕迹的政策。1963 至 1974 年，全岛各地土族村庄的清真寺、神殿和其他圣地被希族塞人摧毁。最近，我方专家进行的实地研究和从访问南塞浦路斯的土族塞人那里收集的信息表明，在南塞浦路斯的 130 多座清真寺中，有 32 座听任其倒塌，其余的大多数状况极差。此外，这些古迹中的所有可移动文物，即数百份《古兰经》手稿、祈祷地毯、古兰经诵读桌和伊斯兰画像都被摧毁或洗劫。

在此背景下，希族塞人代表针对土族塞人方面和土耳其的诽谤言论显然得不到有关该岛的法律和历史事实的证实。因此，希族塞人方面与其对土族塞人方面进行无端指责(这种指责只会在岛上两国人民之间制造不信任和敌意环境)，不如像秘书长在 2019 年 7 月 10 日报告(S/2019/562)所呼吁、安理会第 2483(2019)号决议所欢迎的那样加紧努力，为双方创造有利于合作的氛围。

借此机会，我谨提醒希族塞人行政当局注意，他们的对应方现在是而且一直是土族塞人方面，而不是土耳其。

请将本函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41 的文件分发为荷。

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代表

伊斯梅特·科鲁克奥卢(签名)
